

正午的暮色

—

达·克拉米诺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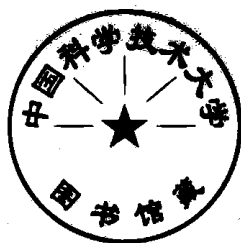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正午的暮色

(第一部)

〔苏联〕达·克拉米诺夫著

吴佑 王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ДАНИИЛ КРАМИНОВ
СУМЕРКИ В ПОЛДЕНЬ

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75 年版译出。

正午的暮色(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4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8\frac{3}{4}$

197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 · 2587

定价 2.85 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以慕尼黑阴谋为背景描写苏联外交人员活动的小说，先在1972—73年的苏联《十月》杂志上连载，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被苏联文艺界头子誉为“国际题材方面的出色成就之一”。作者克拉米诺夫是苏联《在国外》杂志的主编。

四十年前，面对希特勒德国的侵略扩张野心，欧洲出现了一股以张伯伦、达拉第之流为代表的绥靖主义思潮。这种养虎贻患的政策的核心，就是妄图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东方的苏联，希冀苟安于一隅。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则是其必然的一步。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对英法统治集团的这种姑息、让步的绥靖政策，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从而获得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直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但是，由于当时绥靖主义思潮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占了上风，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也还不够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很快就爆发了。这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今天，世界形势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由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妄图称霸全世界，野心勃勃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造成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西方，特

别是在美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绥靖主义思潮。

勃列日涅夫集团惯于接过列宁—斯大林的旗帜，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化身，蒙蔽和欺骗人民，以掩饰其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野心。本书作者是苏修在舆论界的代言人之一，他选择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的苏联同张伯伦政府的绥靖主义政策进行斗争这一历史题材，写了这样一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也正是为了上述目的。他在本书后面的《致读者》一文中，攻击现今那些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危险的西方政界人士为“反动势力”，指名攻击对苏持强硬态度的英国保守党政治家道格拉斯—霍姆（三十年代曾担任过张伯伦的秘书）为“慕尼黑分子”。作者以总结历史教训为名，实则借这本书为勃列日涅夫鼓吹了多年的欧洲安全合作体系和欧安会辩护，攻击英国保守党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而驱逐了大批苏联间谍是“猖狂挑衅”，而对当今鼓吹对苏讲“缓和”、忘记了慕尼黑的历史教训的某些英国工党人物，则加以赞扬。

此外，本书虽然写的是三十年代的事，但其中的一些苏联外交人员那种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的高傲态度，倒是今日苏联外交官的缩影。由于作者是站在社会帝国主义立场看待世界上的事物，书中不少地方都散发着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读者在阅读时是会感觉到这一点的。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二月

第 一 章

安东·卡尔扎诺夫准备搭乘的莫斯科—涅戈列洛耶^①那次车要到傍晚才开出。莫斯科人在首都郊区度过了晴朗的一天，此时正陆续返回市内。一列列挤满旅客的电气列车相继驶入车站，疲乏却又心满意足的人们从车厢蜂拥而出。他们举着秋天盛开的鲜花——白色的、玫瑰色的、红色的菊花和天竺牡丹，还有一束束象笤帚一般的橘红色的槭树、白杨树的树枝。从市郊别墅归来的旅客们高声谈笑，沿着两旁停了列车的月台摩肩接踵地走着，对那长长的列车和最后一节国际车厢的车窗，偶尔漠不关心地投上一瞥。这节车厢开往何处？乘客是些什么人？去干什么？他们不久即将回莫斯科，还是一去不返？这一切都与归来的旅客们毫不相干。这些莫斯科人匆匆离开月台，穿过车站拱门，挤到还散发着白昼阳光余热的市区广场，各自寻路回家。这个星期天的晚上，他们从容就餐，早早就寝。明天等待他们的将是新的操劳，新的乐趣。

安东站在自己的车厢里，车窗开着。他羡慕地注视着

① 白俄罗斯共和国明斯克州里的一个小镇，是苏联边境的小车站。

经过的人流，一想起自己昨天还是其中一员时，伤感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每天早晨，当行驶在林荫道上的“阿努什卡”^①的叮当声把他吵醒时，他就从狭窄的沙发床上一跃而起，冲到窗口，砰地一声关紧窗户，然后又自在地躺到沙发床上，用枕头捂住头，遮住明亮的光线，把那短促的夏梦再延续一、两小时；或在蒙眬之际听着板壁后面女房东送她六岁的孪生女儿上幼儿园时的低声细语。他起身后先在穿衣镜前刮脸，接着一只手拿着夹香肠的面包，另一只手端杯咖啡，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吃早饭。早饭后，他穿过宁静的胡同走上林荫道，在街道拐角的书亭里买份报，然后坐在严格的禁欲主义者季米里亚捷夫纪念碑前那张凉阴阴的长凳上，浏览新闻：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浴血奋战，城市接连失陷，情况实堪忧虑；布拉格面临威胁，德国随时准备入侵，消息令人不安。然后，沿着赫尔岑大街走向大学。对他，现在站在国际车厢窗旁的安东·卡尔扎诺夫来说，这一切都已一去不复返了。安东已过惯了这样的早晨，早已熟悉它的每一细节，他不想改变它——一丝不苟、始终如一正是著名学者与众不同之处。然而，他不会再有这样的早晨了。

新的早晨，安东将要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可能要到国境线上去迎接。在那里，他将告别祖国，直至深夜才到达柏林，然后再从柏林出发，取道布鲁塞尔前往伦敦。他将在伦敦工作和生活。不是生活几个星期，几个月，而是几年。整

① “阿努什卡”，估计是莫斯科人对“A”路有轨电车的昵称。

整几年！

离开莫斯科使安东满怀忧郁和悲伤。这种忧郁和悲伤每分钟都在增强，最后几乎成了肉体的痛楚。安东真想拎起皮箱跑出车厢，汇合在莫斯科人欢乐的行列中，穿过车站拱门走向广场。他热爱这个热闹繁忙、殷勤好客的都市。八年前，莫斯科亲切地接待了他，供他衣食住行，给他聪明才智。在莫斯科繁星满天的长夜里，他感受了初次钻研学问的莫大乐趣，尝到了失败给青年人带来的有教益的痛苦。在这里，他开始成长，并为今后的岁月开辟了光明的坦途……

但是安东仍然站在车窗旁边没有动：想知难而退为时已晚。也无处可退！他是自愿去英国干他的新工作的。杜勃拉文教授说：他卡尔扎诺夫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个看法尽管有些刻薄，然而却是公正的。安东对此的回答却是出乎意料的粗鲁。生性暴躁的格奥尔基·马特维耶维奇·杜勃拉文听后勃然大怒。当安东想谈谈卡佳的问题时，教授怒气冲冲地打断他，下了逐客令。对安东来说，回到系里的大门就此关上了。而对耐心细致地敦促他出国工作的夏维列夫，安东又能说什么呢？夏维列夫把安东召到中央委员会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劝他改行从事外交工作，忠告这位年轻人三思而行，要知道这毕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安东可没有勇气到夏维列夫那里去央求：“对不起，我改变了主意……”这只会使伊戈尔·瓦图耶夫幸灾乐祸！“你们看，”安东想象得出瓦图耶夫那副傲慢嘲笑的神

气，“我早就讲过，卡尔扎诺夫的毛病就是优柔寡断。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谨小慎微的人。有学问并不等于有修养。要知道只有有修养的人才会有勇有谋。外交工作，这是智力的角逐，在这样的角逐中，与真正的，也就是说世代书香的知识分子比，安东这类人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不，他安东·卡尔扎诺夫不会让瓦图耶夫找到冷嘲热讽的口实。他松一松领带，双手往裤袋里一插，举目望着窗外。月台上的人明显地稀少了。安东朝车站的大时钟望去。就在时钟下面，他看到一位姑娘心神不定地在东张西望，好象不知道该跑向哪列火车。她上身穿着一件旧毛线衣，下身是一条又短又旧的黑裙子，连泥污的膝盖也没遮住。在磨损了的便鞋上还沾着菜园里的新鲜泥土。安东立即认出了她，便探身朝窗外大声喊道：

“卡佳！我在这里！在这里，卡佳！”

他冲向车门，把一位正凑在隔壁包间门上辨认号码的狭肩膀、高个子的乘客推到一旁，纵身跳到月台上。卡佳也向他迎面跑来，她突然停住脚步，伸出一只手，手里拿着一束落满灰尘的鲜花。尽管在杜勃拉文的别墅里有绚丽多彩的花圃，但看得出这束花是刚从路旁摘来的。安东接过花束，说声“谢谢！”就垂下了手，矢车菊和药母菊的花也萎靡地垂了下来。他欣赏地看着这位姑娘，仿佛初次见面似的。在他看来，卡佳不仅只是逗人欢喜——这点他早已知道——而且还非常漂亮：她那清秀的面庞，凸出而白皙的前额，短

而挺直的鼻梁，配上一头乌黑而浓密的头发，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她那微陷的双颊通常是苍白的，而现在却红润发亮，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安东惘然若失地说：

“你来啦，卡佳！”

她一本正经地点点头，仿佛她的到来还需要证实似的。然后问：

“要走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以为你想避开我。”

“根本没有避开你，”她表示不同意。

“那天晚上以后，我给你打了许多电话，”安东急忙解释。“早晨打，白天打，晚上也打。接电话的不是费奥克拉，就是你爸爸，要不就是尤莉娅·维克多罗芙娜。第二天我又打，还是早晨、白天、晚上地打，可是你仍然不接电话。等到第三天，干脆谁也不来接电话了。这样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我们到别墅去了，”卡佳轻轻地回答。

“我也这样想，”安东苦笑了一下，接着说，“你们去是为了摆脱我这个无赖汉，因为我打电话时，人家拿起听筒，我就不吭声了。光打电话而不吭声还不是无赖汉？你们可猜到，这是我在打电话吗？”

她又点点头，嫣然一笑。

“大家都猜到了。费奥克拉可怜你，老想要我来接电话，可爸爸总是抢在前头把听筒夺走了。”

“他还是那么恨我？”

“嗯，”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恨透了。”

“我本来没有什么恶意……结果却搞成这样。”

“搞得很糟……”

“我也不想让你作这样的选择。”

“你不想，但事实上是你要我作出选择：要么跟你，要么听爸爸的……”

“是他逼我这样做的。我本想能一切如意，我们是自己人嘛……”

“爸爸已不把你当自己人啦。他说你辜负了他。”

“我辜负了他？”

“说得更确切些，他已对你失望了。他说，在这个卡尔扎诺夫身上我花了多少心血和时间，可全白费了。”

“根本没白费！我会向格奥尔基·马特维耶维奇证明，什么都不会白费。只要那里不再急需我，我就重新搞历史。他们已经答应我……”

“这只会惹爸爸生气，”卡佳向他扫了一眼，打断他说。“爸爸说，一个人要是认真干一件工作，而且真想干出点名堂，那就得付出毕生精力。那些今天干这一行，明天又去钻另一门的人，爸爸称他们为‘跳来跳去的人’。他说‘跳来跳去的人’，既不珍惜自己，也不珍惜事业。人生应该如何度过，他们无所谓，只追求舒适轻松地过日子。”

“我并不追求舒适。他们对我说，派我去干的工作很困难，甚至很艰巨。昨天夏维列夫还再次强调说，我国正面临危险，要我努力工作，似乎能否排除这一危险，就要看我的

工作怎么样了。”

“爸爸对此不过置之一笑，”卡佳说。“他说，对付傻瓜就好比钓鱼，要用不同的诱饵。渔夫就深通此道，有时用蚯蚓，有时用面包瓢，有时就得用花花绿绿的翎毛。可是，人可不是鱼啊。谁要是为了那点可怜的诱饵中计上钩，谁要是为了讨好别人而丢下心爱的工作，爸爸说这种人比鱼还笨，这种人简直是废物。”

“我可不是废物！……”安东委屈地说，“你爸爸讲的不对。最近几个星期，我遇到许多深知内情的人，他们众口一词地谈到，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大家都惶惶不安，有些人甚至吓破了胆。我不认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要我上钩就范。”

卡佳又点了点头，仍然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没人来送你吗？”她明知只有他一个人，还是问了一句。

安东摇摇头。卡佳瞅了他一眼，怜悯地笑了笑。他受不了这样的怜悯，这总是有损他的尊严。他急忙解释，朋友们为什么不来送行。叶菲姆·楚卡诺夫出差去了，要他去“促一促”收割落后的地区。费奥多尔·巴赫钦，不久前在自己家乡见过一面，他答应来莫斯科，结果只来了一封电报：“奉召去州无法送行”。弟弟彼得，安东原想邀他一起去探望双亲，然后在莫斯科度过动身前的最后几天。可他打来一封电报，回答得十分简短而令人不安：“请假未准，电告启程日期，车上见。”沃洛佳·皮亚托夫从柏林归来后，安

东与他约定一起启程去德国首都，但他接到了立即返回柏林的命令。因为那几乎导致德捷战争的五月危机后的暂时平静已告结束，局势再趋恶化，德国十个师进逼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沃洛佳·皮亚托夫接到命令第二天就离开了莫斯科。

“那末伊戈尔·瓦图耶夫呢？”卡佳问，“他干吗不来送你呢？”

“他昨天已经送过了。”

“昨天？”

“是的，昨天，”安东肯定说，“我们在‘莫斯科饭店’聚会，算是为我饯行。他在临别拥抱我时说，无法加入‘送客的行列’了，因为马上要去别墅，星期一才回来。我想他是到你们那里去的，所以请他向大家问候。我认为伊戈尔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会意地一笑，似乎暗示说：‘我知道你这个“大家”是指谁，该做的一定做到。’难道他什么也没对你讲？”

“伊戈尔没来过。”

“那谁告诉你我要走的呢？”

“叶菲姆。”

“叶菲姆？他回来啦？那他为什么自己不来呢？”

“他不来，那是因为他没有回来。”卡佳说着，把一封叠成四折的电报交给安东。安东立即打开那张硬纸念起来：“卡尔扎诺夫今晚由白俄罗斯站乘六点五十分车赴伦敦，务请代为致意，并祝一路顺风，叶菲姆。”

“这是费奥克拉从莫斯科捎来的，”卡佳亲切而又怜惜地看着安东说。“她递给我这封电报时，我刚好在菜园里忙着。我赶忙拉开嗓门问爸爸：‘几点钟啦？’他向窗外看了一下也大声回答说：‘五点四十分。怎么啦？’五十二分有班到莫斯科的快车。我一口气跑到火车站，票也没买就跳上最后一节车厢，然后再从基辅车站到这里。”

安东折好电报，还给卡佳。

“叶菲姆真是好样的！”

“那还用说！”卡佳应着说。

“我只是在最后一封信中向他暗示说，可能就这样与你不辞而别，离开莫斯科。倒是他帮了朋友的忙，要你……”

“根本不是他要我来的，”卡佳刚说了一句就停住了，她发现安东的目光朝她头顶上边望过去。她回过头去，看见旁边一节车厢有几个男人挤在车门口。他们仰着头，盯着站在露天通过台上的一位年轻美貌的妇女。她穿一件薄薄的淡蓝色连衣裙，领子上镶着白色的花边，腰里束着一根白色的漆皮腰带。金栗色的头发用淡蓝色的绸带束着，仿佛闪烁着金色的星光。这位妇女目光朝下，看着送行者赞叹的神情，洋洋得意，满面春风。

“她也要走？”卡佳回过头来，轻蔑地问。

“你认识她？”

“叶莲娜，我们那位尤莉娅的侄女。”卡佳冷漠地说，“我们是同班同学，还很好呢。”

“现在呢？”

“现在几乎不来往了。”

“为什么？”

“太自命不凡了。她不但认为自己最漂亮，而且最聪明，这种想法她是从小就印在脑子里的。起先她想成为芭蕾舞演员，接着又想当歌唱家，最后发现自己才能浅薄，又去念外语。听尤莉娅说，现在她已‘搭上’我们一位名叫格拉奇的外交官。格拉奇从伦敦回来，一共只待十天，可她已经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于是两人登记结婚。现在她不就是到他那里去么……”

安东端详着叶莲娜微微一笑。

“动人的女人！”

卡佳匆匆地打量了一下自己，顿时窘态毕露。赤脚穿着破便鞋，膝盖上沾着泥土，旧的上衣，这样一副邋遢样子来给一个出国的人送行！这怎能引起赞叹，引起微笑呢？

“请你原谅，我就这样跑来……”她抱歉地说，“我太想来看你啦，要是我换套衣服……”

“你说到哪里去啦，卡佳！那有什么意思，我这就高兴极了！”

“可我不好意思呀！真是难堪，临走前给你留下个这样的……可怕的……印象。”

“不是可怕，而是美好……好极啦！”

“我有什么好的？”

“我刚才很苦闷，”安东激动地说，“大家都有人送……大家……连外国人也是如此。就是我没有送。”

“难道我好就好在从市郊赶来送你？”卡佳敏感地打断了他的话。

“对！”安东叫起来，“对！”

姑娘蓦地往后一退，仿佛有人挥起拳头准备打她似的。安东抓起她的手把她拉到身边。

“对，就是因为你赶来送我，”安东瞧着她那委屈的眼神，又重复了一遍。“你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多有意义啊。”

“没有人送你感到苦闷？”

“不，今后孑然一身使我感到苦闷，”安东纠正她说。“那天晚上之后，我一直坐立不安。要知道，我是多么眷恋你，同格奥尔基·马特维耶维奇，甚至同尤莉娅·维克多罗芙娜我也相处熟了……她那习以为常的嘲笑、挖苦反倒使我……变得更好些。你们一家使我感到亲切，一旦失去它，我确实很难过。你赶来送我，这说明还可挽回。卡佳，我不是在胡思乱想吧？”

她茫然地笑了笑。

“你的事，爸爸连听也不要听。而尤莉娅，你离开，她才高兴呢。她说，‘谢天谢地，这下眼皮底下也可以清静啦。’她还要我对伊戈尔更关心些。‘喏，’她说，‘人家才算是真正的年轻有为。有修养，有学问，聪明能干。’”

“那么你呢，卡佳，你呢？”

姑娘无可奈何地垂下手。

“我怎么？”

“你跟我吗？肯跟我一起吗？你跟我走吧！”

“跟你到哪里去？到哪里呢？你可是要出国……”

“我会回来的……”

“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就回来！夏维列夫答应只要等我到伦敦安排妥当，熟悉业务之后，便提供来莫斯科的机会，可能半年以后。”

“半年以后！”她伤心地叫起来。“这你还叫很快？”

“现在局势复杂而紧张，”安东把夏维列夫的话重复一遍，“再早恐怕不容易脱身了。”

“半年！半年！”

“我一定回来，回来接你，卡佳。你可要等我。”

“我早就在等你。”

“那就再等一等，”安东一边轻声请求，一边往车门后退，列车员已在催促旅客上车就位。“再等一等。”

“我等你，”卡佳同样轻声地答应安东，跟着他往前移动了几步。“等你……”

火车猛地一晃，开动了。安东回头一看，懊恼已极：这次本来想向卡佳诉说自己早就想表白的最重要、最迫切的心愿，但又未能如愿以偿。他象往常一样心里想“下次再说吧……”便搂着卡佳的肩膀，急促地吻了她一下。当他退到车厢门前时，目光与叶莲娜的相遇，只见她嘴角挂着讥笑，依然站在通过台上。安东跳上脚踏板，握住扶手，向外探出身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卡佳。月台徐徐后移，卡佳与其他送行的人们也渐渐远去，他们挥舞着帽子、手帕、双手。安东一